臺灣師大歷史學報　第 53 期
2015 年 6 月，頁 207-218
DOI: 10.6243/BHR.2015.053.207

評介楊奎松，《忍不住的「關懷」：1949 年前後的書生與政治》

賴胤曄*

書　　名：《忍不住的「關懷」：1949 年前後的書生與政治》

作　　者：楊奎松

出 版 社：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3年

頁　　數：xxvi+385頁

一

知識分子與政治的關係向來是學術研究的核心課題，知識分子在世變之下的因應態度，更是歷史學者關切的焦點。中共建國之後，不少知識分子面臨政治立場與思想選擇的困境，過去對中共政府統治下的知識分子研究，也多以考察兩者的關係爲主。例如傅國湧 2010 年出版的《抉擇：1949 中國知識分子的私人記錄》以及謝泳 2013 年出版的《逝去的年代：中國自由主義分子的命運》等書，均呈現了知識分子在大時代變化下無可奈何之境遇。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生

本書作者楊奎松於民國史研究享有盛名，其著作深入且廣泛地探討了現代中國的政治與思想等課題。2013 年出版的《忍不住的關懷》一書，以過往知識分子與政治關係之相關研究爲基礎，廣泛運用各種史料，提出頗多新穎的見解，有別於傳統史學研究的宏大敘事方式，爲中共史研究提出不同的觀照角度，透過分析中共政權與知識分子的互動方式，更爲深入地探討知識分子政治立場變化的過程。

作爲研究 1949 年前後知識分子的著作，本書有別於過去對知識分子心態選擇的考察中，單一選用日記、文集或回憶錄等資料分析的方法，而是選取大量檔案中知識分子自我檢討的紀錄，以張東蓀、王芸生與潘光旦三名知識分子爲例，考察他們在建國前段歷史脈絡中的猶疑與決然，憧憬或徬徨等劇烈的心理變動，同時藉由他們對中共思想認同的先後與程度，將個人的生命歷程投射於 1949 年以後的知識分子群體命運。透過政治中的「知識分子」與實際生活中的「書生」交叉對照，鮮活了這些知識分子的形象面容，更超越過去知識分子研究的侷限，承上啓下，栩栩如生地還原了中國建國初期歷史發展中，知識分子的呼吸與脈動。

二

本書共分三章，依次討論張東蓀「叛國」案、王芸生與 1949 年以後的《大公報》以及潘光旦的「思想」與「改造」問題。作者自謂撰書目的並非試圖釐清至今難以定論之「何謂知識分子」問題，而是提供另一種思考方向：「中國有我們想像中的『知識分子』嗎？」（頁 ii）

楊奎松認爲，我們過去對「知識分子」的看法可能存在著定位不當的問題，忽略了他們同樣具有「人」的身分，同樣具備七情六慾，在面對強權或強大暴力時，一樣會軟弱或屈服。本書所討論的三位知識分子，雖然不是達官顯貴或是中共重要的統戰對象，卻也是 1949 年以後留在中國大陸知識分子中較具代表性的人物。

張東蓀雖爲哲學教授，對政治活動卻抱有極大的參與熱情。楊奎松運用大量建國前後的檔案文獻，指出張東蓀因大力支持經濟上社會主義、政治上民主自由的新民主主義，在 1949 年以前的立場已經悄然轉向理解中共，政治觀點也逐漸左傾。對於中共在 1949 年後對張東蓀高度重視的原因，過去的研究大多傾向於他對北平和平解放的特殊貢獻。作者則指出，張東蓀在北平解放時只是擔任過一次北平前線國共兩軍談判的見證人；此外，張東蓀向來對以自己爲中心所集結的政治勢力十分用心，然而中共建國後並未將關注點轉到國家民族的和平建設上，致使其政治企圖與規劃難以落實，因此頻頻與美國接觸，致而有所謂張東蓀「叛國案」的出現。

楊奎松認爲張東蓀與美國外交人員頻繁接觸的一個主要目的，乃是怕中共全面倒向蘇聯後，美國會簡單地將中蘇視爲一體、當作敵人，因此「尋找溝通美國之方法」。此外，張一方面堅持自己的自由主義立場、一方面堅信中共建國以後的路線行不通，必須改變，到時候自己才有資格站出來講話，因此張在 1949 年後幾乎不屑於公開附和共產黨。只是隨著思想改造運動的展開，加上協助張與美國接觸的商人王正伯被捕，張東蓀與美國的聯繫遭到披露，他的處境越來越艱難。作者認爲，張所具備的強烈抱負與固執個性，導致他形成迷信美國新武器終將勝利，中國親蘇是錯誤選擇，以及害怕蔣介石捲土重來等基本觀念。張癡迷於政治，對自己在政事上的見解頗爲自得，這樣的心理也影響了張的判斷視角，凡此皆爲張在中共建國初年成爲被打擊對象的原因。

王芸生自 1941年起即擔任《大公報》的總編輯。自 1930年代以來，《大公報》以其在中國的發行量與言論影響力，稱得上是中國輿論界的「龍頭」。國共內戰期間，王芸生撰寫社評，抨擊國民政府，也批評共產黨。然而，隨著國民黨的敗退以及天津《大公報》被更名爲《進步日報》，王芸生開始調整立場，與過去決裂。對於「報人」王芸生與《大公報》之相關研究，過去學者多集中

於王芸生「投降」一說之爭論，或分析王芸生的新聞理念，對王芸生與政府關係的討論，大都僅依據個人回憶，受主觀偏見影響較深。[1]楊奎松在本書中則是嘗試對照已開放之檔案史料，觀察中共建國前後王芸生的政治轉變和《大公報》被改造的曲折過程。

王芸生對中共態度上的轉變，適時配合了中共對《大公報》政策的調整，故得以繼續用社長兼任總編輯的身分執掌上海《大公報》。1950 年 7 月，中共在上海市成立的新聞協會，更進一步強化政府對私營報紙的管控，《大公報》因經濟問題也轉爲「私營公助」。然而，即使已經配合政策調整了思想立場，《大公報》最後仍需與天津《進步日報》合併，且以公私合營的方式解決經營不善的問題。由於《大公報》無論權力分配或人員設備都必須遷就《進步日報》，其黨組書記又專斷獨行，過去《大公報》的成員期望缺乏實權的王芸生帶領眾人恢復《大公報》的特色與榮光。王芸生的回覆卻清楚表明其擁護並遵從共產黨指示的態度。楊奎松特別強調，王在反右運動中能夠全身而退，並非過去研究中普遍認爲王受到毛澤東保護之故，實際上是與王的思想立場明確有關。王芸生在政治認同上較快的轉向也使他較之其他知識分子，獲得更爲平靜的生活與政治地位。

與王芸生相比，不論在政治態度或思想認同上，潘光旦則是花費了相當的時間精力「進入狀況」。在本書中，潘光旦佔有最多的討論篇幅。楊奎松考察潘在 1948 年以前的歷史，認爲優越的家境與規範的家教助長潘光旦對傳統文化的偏好，此外，潘固執堅

---

[1] 近年來對王芸生之研究有不少為碩士論文。在中國大陸方面有張默，〈解析王芸生“文人論政”的內在精神特質〉（南寧：廣西大學新聞學系碩士論文，2011）；張毅，〈王芸生新聞思想研究〉（西安：陝西師範大學新聞學系碩士論文，2008）；袁帥，〈王芸生的自由主義新聞思想探析〉（哈爾濱：黑龍江大學新聞學系碩士論文，2008）。臺灣多以分析《大公報》在戰爭期間的輿論立場為主，例如劉羿穎，〈《大公報》在國共內戰初期立場之研究 1945.12-1947.1）〉（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0）；高郁雅，〈北方報紙輿論對北伐之反應—以天津《大公報》、北京《晨報》為代表的探討〉（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1996）；龔麗英，〈中共對臺統戰宣傳之研究—以一九七九～一九八二大公報報導為例〉（臺北：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系碩士論文，1982）等。高郁雅的論文另行出版，參高郁雅，《北方報紙輿論對北伐之反應》（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8）。

定的性格也影響了他的政治態度。清華大學畢業、留美歸來後，潘光旦加入 1924 年清華留美學生成立的「大江會」，企圖改造中國政治。[2]嗣後，與羅隆基、徐志摩等人一同參與《新月》雜誌，當《新月》作者受到當局壓迫不得不各奔東西時，潘因甚少發表與人權自由相關之文章，受到的衝擊相對輕微。1932 年潘光旦在青年會的資助下創辦《華年》周刊，透過討論共產黨問題，旁敲側擊地批判國民黨「黨治」，但是潘光旦對共產黨的暴力革命並無好感，也非試圖推翻國民黨政府，而是希望它有所改變。

潘光旦加入中國國家社會黨後，對國家統一的訴求日益強烈；又因不滿國民黨一黨專政，因此加入了與共產黨密切聯繫的民主政團同盟。儘管如此，當 1944 年以後民盟內部的左翼成員越來越接近中共，潘光旦批評蘇聯的文章便與之扞格不入，加上「一二一事件」以及「李聞慘案」的發生，他開始反思自己在批評時政的同時是否做到客觀理性，從而更加堅定的往中間路線靠攏。[3]

1949 年以前的潘光旦雖然反對蘇聯與共產黨的思想，卻仍是民盟的骨幹之一。楊奎松指出，潘光旦在中共建國前的思想傾向並非 1949 年之後遭到鬥爭的主要原因。中共建國初期，他尚不屬於大學中「反動派」的主要人物。但是隨著部分「最反動」的教授成爲黨的積極進步者，潘的政治態度消極，抵觸情緒明顯。直到 1950 年代後潘政治參與提升、閱讀大量政策文章並逐漸掌握中

---

2 「大江會」係清華大學學生的政治性社團，經歷了通信小組與大江學會兩個階段。大江會主張 「大江的國家主義」，強調「對內實行改造運動」和「對外反對列強侵略」，首要任務則是「暫時偏重反對列強侵略與鼓勵民氣」。見聞黎明，〈聞一多與“大江會”—試析20年代留美學生的“國家主義觀”〉，《近代史研究》，1996：4（北京，1996.8），頁170-194。

3 「一二一事件」起因為1945年11月25日昆明西南聯合大學、雲南大學、中法大學等校的師生發起反內戰罷課示威活動，並與反對者爆發衝突。12月1日軍官總隊集體前往聯大師範學院接受學生質詢時，失業軍人陳奇達向群眾投擲手榴彈，學生亦以手榴彈還擊，造成嚴重的流血傷亡。「李聞慘案」則為1946年李公樸、聞一多遭到暗殺的事件。1946年7月11日晚，李公樸外出返家時遭到槍擊並於次日逝世。7月15日上午，聞一多赴雲南大學致公堂參加李公樸死難經過報告會被特務跟蹤。下午往民主週刊社舉行記者招待會，表明反獨裁、反內戰的聲明後，在距家門不遠處遭槍擊而亡。

共意識形態，才開始發自內心學習共產思想、擁護共產黨。

潘光旦的思想變化與緊跟形勢的決心既已確立，因此在 1950 年下半年並未成爲運動的重點對象。但是他在學習運動時態度隨意，遭到群眾強烈的反感，致使個人問題升級，逐漸變成全市高校思想改造運動鬥爭的重點人物，更有《潘光旦反動言論摘要（一）》一書的編印。民盟清華大學校區分部的盟員也召開全體盟員大會，指出潘光旦與反動派關係密切，一貫站在反動立場親美反蘇，且在民盟內部搞宗派。強大的政治壓力導致潘光旦民盟區委及主任的職務遭到撤除。

1952 年潘光旦的檢討終於過關。他將注意力轉向學術研究，卻又因研究課題成爲中央和地方角力的犧牲品，加上他與羅隆基、費孝通私交甚篤，和民盟關係密切，更是中央打擊的對象。1958 年潘光旦雖摘去右派帽子，卻在文化大革命爆發後，因擴大化的政治批鬥、抄家而病逝。

三

《忍不住的關懷》一書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前後知識分子思想、政治認同上的轉變，進行頗爲深刻的考察，使吾人得以更透徹地理解這些遭遇重大時代轉折的知識分子之心路歷程，以及他們在歷史洪流中所扮演的角色。以下擬從研究視野、章節安排、材料使用以及論點分析等四個方向，提出筆者閱讀本書後之淺見。

就研究視角來看。全書的敘事策略是對知識分子寄予同情的理解，由此評論中共建國後知識分子政治立場的選擇與變化，強調歷史研究者應該具備對研究客體的充分理解，方可立於客觀角度下評述。作者指出，過去對知識分子的研究，大多因第一手史料掌握不足，或是掌握部分史料即主觀先行、隨意支解。他所切入的研究角度是深入知識分子內心，跟隨其立場的轉折變遷，呈現知識分子群體中同中有異，異中存同的現象。過去對建國前後中共與知識分子的相關研究，中國學者大多聚焦於中共中央如何

進行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集中在思想改造發展的歷史背景、發生原因以及社會影響等層面，臺灣學者則傾向討論中共的知識分子政策，考察中共的思想控制以及知識分子與新政權之間的關係。[4] 2000 年以來，中國歷史學者對知識分子的研究呈現三方面的特點：其一，注重知識分子的時代責任和精神需求；其二，注意微觀問題和專業問題；其三，強調全球化視角下知識分子的特殊性。[5]作者在此趨勢下，有別於過去宏大敘述方式的傾向，不再單純將歷史事件做結構化的分析，而是以史料梳理以及旁徵博引各種資料，分析事件中「個人」的心理活動，從「上層」的敘事論述轉向微觀，研究視野與目前中國對知識分子研究之方向一致。但是，貼近研究主體的內心卻容易使研究者失之客觀，難以平衡資料與解讀者的關係。如作者在討論張東蓀叛國案時認爲，與其猜測中共高層對張東蓀問題的看法，不如多在張身上找原因。（頁87）以往的研究甚少討論張如何在政治高壓下一步步交代認錯的心理轉折，作者在本書利用張東蓀詳盡的檢討材料分析其思想轉變與高壓政治下的生存狀態，可謂別開生面。但是將視角悉數投注在張東蓀本人身上，難免無法具體呈現當時政治情境與社會脈絡，甚至研究角度片面化的問題。

另外，作者強調應關注張東蓀、王芸生、潘光旦在歷史、教育、理論素養與政治信念乃至於政治性格的不同與理解，但是全書最終以三者的個性去解釋政治認同的變化過程，則又似失之嚴謹。探討知識分子的心態轉折、精神狀態是目前歷史研究的熱門課題。在宏觀的時代視角中加入個人歷史命運之探索，確能突破政治與學術二元對立的思考模式，然而，本書明確時間斷限爲 1949 年前後，也使用毛澤東下達的政治指示、黨部會議記錄等資料，卻對大時代整體的背景脈絡缺乏論述，換言之，對知識分子的外部「語境」提供的線索顯然不足。例如本書強調可多利用建

---

4 劉穎，〈新中國成立初期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研究述評〉，《廣西社會科學學報》，2011：10（廣西，2011.10），頁85-89。

5 譚獻民、王軍，〈建國以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研究述要〉，《燕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3（河北，2010.9），頁13-18。

國後各種政治運動所保存下來的檔案材料進行分析，但對張東蓀身處的燕京大學如何進行思想改造運動，整體背景著墨不足，多聚焦於張東蓀個人的自我檢討。事實上，燕京大學思想改造運動發展到最後，張東蓀已經在個人思想問題、「叛國案」等因素的影響下，成爲中共中央指示下的燕京大學典型問題人物，但作者對張東蓀叛國案的討論卻又強調其被中共放棄的原因並非政治歷史問題，而與他獨特的個性、觀念密切相關。（頁57）如此簡化外界客觀環境的影響，轉而強調其內心立場變化使政治地位有所差異，則書中細緻爬梳叛國案的歷程、中共中央態度丕變的研究分析似乎便喪失意義。

就章節安排來看。本書各章連結似不夠緊密，對張東蓀、王芸生與潘光旦三者之間的論述難以產生對話與延續。作者在各章節以事件爲主軸串連，卻也予人種種事件突兀出現又突兀中斷的錯愕感。此外，全書篇幅偏重介紹潘光旦的個人歷史，部分原因可能是過去研究者資料掌握不佳，無法完整論述潘光旦與中共錯綜複雜的歷史關係，且潘的相關資料多樣、文集豐富，有助於作者對潘之一生重作分析，但也造成本書對張東蓀、王芸生、潘光旦三者討論輕重不一，使讀者產生難以聚焦之感。

在材料使用方面，本書除了利用過去出版的中國官方史料集，諸如《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中華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誕生記事暨資料選編》、《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文獻選編（1937-1949）》之外，更徵引大量北京、上海檔案館的原始檔案資料，以知識分子個人的回憶錄、發表的報刊文章爲主，透過年譜、日記以及回憶錄的使用，加上1940至1950年代報刊雜誌的佐證，細緻地重現張東蓀、王芸生與潘光旦三人心態的轉折。這些史料過去雖有學者研究使用，但卻未能進行完整的融會分析，透過本書作者的爬梳，三位知識分子與中共撲朔迷離的關係躍然紙上，頗能補前人研究之不足。目前學界已經出版的相關研究，例如謝泳《逝去的青春：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命運》一書中收集了張東蓀部分友人對他的評價；呂文浩《中國現代史思想上的潘光旦》一書將

潘光旦置入中國現代思想史的脈絡中分析其思想內容、特點與意義等問題，[6]兩者均爲值得參考的相關研究。然而本書作者卻指出，上述研究大多是被研究者家屬口述的感懷之作，未能對真正的歷史問題研究，作出全面與真實的還原。（xvii）作者似乎企圖破除過去歷史人物研究中，因採取私人日記或回憶錄而造成的主觀意志侷限、內容受限等缺點，故大量採用政治運動所留下的檔案紀錄，以及報紙文集，以其拓展以往研究的侷限性，透過個人的生命歷程反映「宏大的國家記憶」。1949 年後各種政治運動中，當事人或被迫、或自願所書寫的檔案報告，比起「私人紀錄」或許在解讀歷史方面更具價值，研究觀點更爲全面，但是中共建國後發起的繁多運動均有不同政治目的，研究者如何由大量資訊中梳理歷史人物背後的意識形態誠屬不易。本書選用的各類檔案是否能全面呈現人物面貌，均需要詳細檢視。大體而言，「私人紀錄」可以挖掘許多書面上無法找到的材料，填補歷史上留下的空白，縱然記憶往往會隨著年齡、外在政治氣氛、環境而改變，就嚴謹的學術角度來講，只能成爲史料而非歷史本身，然而其與家屬參與之歷史著作，仍具一定參考之價值，作者將此類作品定位爲感懷之作，似失之公允。

作者特別指出戴晴《在如來佛掌中──張東蓀和他的時代》一書中關於張東蓀「叛國案」的認識與判斷偏頗武斷，過度渲染張東蓀不屈權勢的沉默態度，並認爲戴晴書中的「傾向性」過於明顯，且因採用的史料證據不足，故推論容易出現矛盾。作者與戴晴的研究差異，在於戴晴以爲中共中央重視張東蓀的原因與他促成北平和平解放協議有關，但是作者細究中共中央與平津前線領導人之間的來往電報內容，認爲張東蓀的貢獻只在參與，而非促成，張東蓀受重視的本因其實與他在平津被圍、和談之事發生前就支持中共更有關聯。然而戴書強調張東蓀在北平協議的貢獻，

[6] 謝泳，《逝去的青春：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命運》（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3），頁 94-98；呂文浩，《中國現代史思想上的潘光旦》（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

在於中共企圖借重張東蓀的社會信譽，凸顯中共「北平和平交接」的仁義文明，與作者以共產黨軍事解放的角度切入不同。[7]由於關注的方向相異，解讀材料背後意識型態的方式也會產生分歧，倘若作者在處理北平解放與張東蓀的關係之餘，能夠重新檢視張東蓀的參與對共產黨進入北平的過程、社會輿論有何種影響，而非只是探討張東蓀對北平解放有無幫助，必可加深其論述層次。

在論點分析方面，本書緊扣知識分子的思想認同以及中共中央政策態度，將兩者互爲主體，探討中共政府的政治掌控以及知識分子的立場選擇，闡述中共對知識分子政策雖在建國初期以統戰爲主，卻已透露由內而外皆企圖全面控制的本質。在作者筆下，這群受到政治宰制的知識分子仍具有強烈的主體性與能動性。本書的宗旨正是透過考察張、王、潘三位知識分子在建國前後思想轉變的過程，呈現群體中的個人差異，頗能破除以往研究者多將知識分子視爲完整集體而無異同的概括論述。然而，作者在書中強調知識分子的政治、思想認同與其個人未來境遇有密切關係之論點似乎略顯矛盾。如作者指出，張東蓀、潘光旦、王芸生三人在政治上、思想上對中共新政權的認同先後以及差別問題，頗難定論且見仁見智。（頁 xxiv）既然如此，作者將三人經歷並列分析之意義何在？作者將三人政治運動材料作爲反映人物心理、時代氛圍的要素，處於同一時空的三人卻未在書中產生交集。其人生經歷之異同是否能夠使讀者清楚理解思想認同與政治影響之關係？似乎應有更深入解釋。此外，作者認爲這三位歷史人物均具代表性，卻未具體說明代表性何在。以職業論之，張東蓀與潘光旦較爲相近，但兩者與王芸生無論教育背景或工作場域來看並無相似之處，三人的共通點在於因思想立場無法符合中共政治方針，人生事業從此下滑，其後本書卻缺乏更進一步的探討分析，例如中共中央對此三者政治問題上的處理態度有何差異，

[7] 戴晴，《在如來佛掌中—張東蓀和他的時代》，（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頁31。

原因何在？或是三位知識分子遭受政治打擊後的心態轉折過程、應對方法是否有相似之處，均值得細究。

如前所述，作者強調必須對知識分子寄予同情的理解。但是，過度同情的理解是否會使立場失之客觀，將成爲研究上的疑點。理解雖爲必要，距離仍須拿捏。文藝心理學中，讀者與文本的心理距離（Physical distance）現象，一樣存在於研究者與被研究主體之間。距離太近，就不能用「處之泰然」的態度去研究；距離較遠，研究的主體和客體之間才能存有一種適當的距離，研究者方可用較客觀的態度進行分析。如何適度與恰當的丈量研究對象、文本史料以及讀者間的距離，也是每一個研究者都必須思考的課題。

引用書目

一、專書

呂文浩，《中國現代史思想上的潘光旦》，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
高郁雅，《北方報紙輿論對北伐之反應》，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8。
戴晴，《在如來佛掌中──張東蓀和他的時代》，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
謝泳，《逝去的青春：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命運》，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3。

二、近人論文

高郁雅，〈北方報紙輿論對北伐之反應──以天津《大公報》、北京《晨報》爲代表的探討〉，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1996。
袁帥，〈王芸生的自由主義新聞思想探析〉，哈爾濱：黑龍江大學新聞學系碩士論文，2008。
張默，〈解析王芸生“文人論政”的內在精神特質〉，南寧：廣西大學新聞學系碩士論文，2011。
張毅，〈王芸生新聞思想研究〉，西安：陝西師範大學新聞學系碩士論文，2008。
聞黎明，〈聞一多與“大江會”──試析 20 年代留美學生的“國家主義觀”〉，《近代史研究》，1996：4（北京，1996.8），頁 170-194。。
劉穎，〈新中國成立初期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研究述評〉，《廣西社會科學學報》，2011：10（廣西，2011.10），頁 85-89。
劉羿穎，〈《大公報》在國共內戰初期立場之研究 1945.12-1947.1）〉，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0。
譚獻民、王軍，〈建國以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研究述要〉，《燕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3（河北，2010.9），頁 13-18。。
龔麗英，〈中共對臺統戰宣傳之研究──以一九七九～一九八二大公報報導爲例〉，臺北：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系碩士論文，1982。